

西周

金文王年考辨

王程远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XIZHOU

JINWEN WANGNIAN KAOLIAN

西周

金文王年考辨

王程远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曾春宁
责任校对:王小方
封面设计:墨创文化
责任印制:李 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周金文王年考辨 / 王程远著.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2. 9

ISBN 978-7-5614-6197-6

I. ①西… II. ①王… III. ①金文—中国—西周时代—文集 IV. ①K877.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29689 号

书名 西周金文王年考辨

著 者 王程远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14-6197-6
印 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85 mm×260 mm
印 张 10
字 数 191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 000 册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
联系。电 话:85408408/85401670/
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 <http://www.scup.cn>

目 录

引 言	(1)
武王克商年代考	(28)
一、对月象词的认识	(29)
二、对星象词的认识	(31)
三、武王伐商时所用历法辨识	(36)
四、克商年代的推断	(39)
五、武王伐商过程的月、日序表	(43)
金文历日与列王年辨识	(47)
一、《卫簋》	(52)
二、《何尊》	(53)
三、《师旦鼎》	(53)
四、《师卣敦》	(54)
五、《三年卫盂》	(55)
六、《庚嬴鼎》	(55)
七、《伊簋》	(56)
八、《五年师虎簋》	(56)
九、《九年卫鼎》	(56)
十、《乖伯簋》	(57)
十一、《大鼎》	(58)
十二、《静方鼎》	(58)
十三、《作册旂尊》	(59)
十四、《作册令方彝》	(60)
十五、《令簋》	(61)
十六、《逆钟》	(62)
十七、《十五年赵曹鼎》	(63)

十八、《智鼎》	(64)
十九、《师遽簋盖》	(64)
二十、《七年趯曹鼎》	(65)
二十一、《趯鼎》	(65)
二十二、《师虎簋》	(66)
二十三、《颂鼎》	(66)
二十四、《蔡簋》	(67)
二十五、《元年师旋簋》	(67)
二十六、《达盥盖》和《驹尊》	(67)
二十七、《四年癸盥》	(68)
二十八、《伯吕父盥》	(69)
二十九、《五年师旋簋》	(69)
三十、《牧簋》	(70)
三十一、《太师虢簋》	(70)
三十二、《走簋》	(71)
三十三、《伯克壶》	(71)
三十四、《此鼎》	(71)
三十五、《休盘》	(72)
三十六、《曩盘》	(72)
三十七、《晋侯稣编钟》	(73)
三十八、《四十二年逯鼎》和《四十三年逯鼎》	(74)
三十九、《兮甲盘》	(77)
四十、《士山盘》	(78)
四十一、《吴虎鼎》	(78)
四十二、《鲜簋》	(80)
金文历日“初吉”辨识	(85)
一、《克钟》	(91)
二、《段簋》	(92)
三、《无其簋》	(92)
四、《克盥》	(93)
五、《邠盈簋》	(94)
六、《山鼎》	(94)

七、《师伯硕父鼎》	(95)
八、《散伯车父鼎》	(95)
九、《说盘》	(96)
十、《望簠》	(96)
十一、《番匋生壶》	(97)
十二、《鄫簠》	(97)
十三、《迁簠》	(98)
十四、《柞钟》	(98)
十五、《永盂》	(99)
十六、《十三年癸壶》	(100)
十七、《元年师兑簠》(器和盖)与《三年师兑簠》(器和盖)	(100)
十八、《趯尊》	(104)
十九、《王臣簠》	(104)
二十、《五祀卫鼎》	(104)
二十一、《宰兽簠》	(105)
二十二、《齐生鲁方彝盖》	(105)
二十三、《郑季璽》	(106)
二十四、《谏簠》	(107)
二十五、《成钟》	(107)
二十六、《伯和父敦》	(108)
二十七、《师鞞簠》	(108)
二十八、《虢季子白盘》	(109)
二十九、《鬲从鼎》	(110)
《晋侯稣编钟》历日辨识	(115)
《逯鼎》历日辨识	(122)
《克钟》年代辨识	(129)
《师兑簠》历日辨识	(135)
《成钟》辨识——与张闻玉商榷	(140)
《吴虎鼎》历日辨识	(146)



引 言

本书是接续《商周断代新考》而对西周列王年代的考证，《商周断代新考》解决的是武王伐商的年代和时日，《金文王年考辨》通过对出土的青铜器中记载的铭文历日进行辨识，推断各个王世的年代。

公元前 1039 年夏历三月四日甲子黎明时分，在商都朝歌（今河南淇县）以南三十多公里的牧野平原上，发生了一场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战争，死人很多，当时恰值降雨，以致“血流漂杵”，这就是有名的商周牧野之战。这场大战进行了不到一个时辰，商纣王的 17 万大军，就被周武王的 350 乘战车、3000 虎贲军和 4 万甲士打败；傍晚，纣王在鹿台自杀。至此，存在了近 500 年的商王朝灭亡，周王朝建立。这个年代时日的确定，为我们找到了周王朝的起始之年，它是考证和推算以后各个王世年代的“基点”，列王的年代由此开始依次接续下去，假若武王克商年代判断错误的话，以后王世年代的正确性就无从谈起了。所以，本书把《武王克商年代考》列为第一篇。

自公元前 1039 年武王克商，至公元前 771 年幽王为犬戎所杀，这一时期，后世史家称之为“西周”。西周王朝存在的总年数，前后共计 269 年。但是，有人不同意笔者的判断，指出一个问题，即与《竹书纪年》记载的“二百五十七年”之数不合。

十分明显的，这个问题如果不能作出正确的解答，则“武王公元前 1039 年夏历三月四日甲子克商”的判断就不能成立。其实，武王伐商时间上的问题，文献记载的还有很多，涉及方方面面，只是上述问题比较突出，也很关键。所以，我们从这里入手再加讨论，并由此引发开来，论及其他。

《竹书纪年》曰：“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这个记载，少数学者认为就是西周存在的总年数，大多数学者则不同意，因为“257 年”之数得不到印证，似乎不正确。其实，《竹书纪年》的记载是正确的，问题在于对“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这句话当如何理解？表面看似十分清楚，但其可以作两种理解：一是从武王灭殷之年起，到幽王被杀之年止；二是从武王

克商之次年，即公元前 1038 年（成王元年）算起，到幽王继位之时（宣王死年）的年数，也就是说，257 年这一数字，不包括武王克商的那一年和幽王在位的 11 年。所以，解读它的关键是要弄清楚“二百五十七”这个年数的上限和下限，真正落脚点在哪里？笔者认为，应该是第二种理解才对。这可以从多方面得到证明：首先，从正确认识星象词入手，用已知的岁星运行规律去推算年代。其次，武王克商后尚未改元，当年十二月便病亡了；次年成王继位，所以，周的年代应自成王元年起计算。再次，作为划分历史年代先后称谓的“西周”、“东周”两个概念，在先秦（春秋、战国）时期是没有的。幽王由于废太子宜臼，引起了申侯的不满，申侯勾结犬戎作乱而杀死幽王。幽王死后，战乱不止，镐京被毁，朝廷陷入混乱之中，太子宜臼（平王）由“申侯、鲁侯及许文公立于申”。同时，“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周二王并立。”十多年后，“携王为晋文侯所杀”，二王并立的局面才算结束。平王在晋、郑、卫诸国的帮助下，定居于洛邑。《国语·周语》中讲到宣王的晚年和幽王时期，说：“宣王既丧南国之师，乃料民于太原。仲由父谏曰：民不可料也！……王卒料之，及幽王乃废灭。”又说：“水土无所演，民乏财用，不亡何待？……十一年幽王乃灭，周乃东迁。”这明显流露出对宣王末年的不满情绪，认为祸由此起。所以，“257 年”其下限是宣王死和幽王继位之时。

对“257 年”的上限和下限的真正解读，主要是在认识星象词和岁星运行规律的基础上得出的。《国语》载：“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星在天鼋。”这里所说的便是周武王伐商时的星象。以往均将其解释为：武王伐殷时，岁星是在“鹑火星次”。这其实是误解。以此错误认识为前提，所以不能正确地推算出武王伐商的年代。因此，如何理解“岁在鹑火……星在天鼋”就是一个关键问题。

武王伐殷时的天象，正确的认识应该是：岁星当时在“天鼋星次”；“岁在鹑火”一词的意思为仲春之月，相当于夏历的二月。所以，整句话的意思是：昔年武王伐殷，是仲春二月，岁星在天鼋星次。《史记·天官书》中有一段话便是很好的注释：

单阏岁，岁阴在卯，（岁）星居子，以二月与婺女、虚、危晨出东方。

“星居子”与“星在天鼋”同义，是说岁星这年运行在“子”的位置；“子”位在正北方，“天鼋星次”即女、虚、危三宿的区位，仲春二月的早晨可以看见岁星与婺女、虚、危三宿一同出现在东方；“岁在鹑火”即《尧典》所



说：“日中星鸟，以殷仲春”，二者同义，柳、星、张三宿（即鹑火星次）仲春二月黄昏时出现在南方（即“午”的位置）。“鹑火星次”与“星在天鼃”方位始终是相对的，一个表示月份，一个表示年份。所以，从《史记·天官书》的那段话可以知道：武王伐商的时间是仲春二月，为单阏之岁。

在认识武王伐商时岁星是在天鼃星次的基础上，可以以岁星的运行规律推算年代。岁星实际上是一岁走 $1\frac{1}{86}$ 星次，即 86 年走 87 个星次，也就是说，每 86 年超一个星次。但“超次”是逐渐积累的，因此，“超次之年”是在 86 年的最后一年。笔者在推算中发现，“超次之年”都落在“天鼃”、“大梁”、“鹑火”、“大火”四个星次上；“超次之年”岁星恰好于立春日进入上述四个星次之一，既不超前，也不滞后。古人可能观察到了这一现象，因而认为这些年份是“吉利之年”。这就为我们推算年代时提供了一个可以参照的标志。

由此可见，古人并未真正了解岁星是一岁走 $1\frac{1}{86}$ 星次，每 86 年超一个星次；但是，古文献的记载，是古人实际观察的记录，基本上是正确的。《国语·晋语四》载董因的话，讲晋文公流亡在外 19 年回国时当年的星象：

十月，惠公卒。十二月秦伯纳公子。……董因迎公于河，公问焉，曰：“吾其济乎？”对曰：“岁在大梁，将集天成，元年始受，实沈之星也。实沈之墟，晋人是居，所以兴也。今君当之，无不济矣。君之行也，岁在大火，阙伯之星也，是谓大辰。辰以成善，后稷是相，唐叔以封。……且以辰出，而以参入，皆晋祥也，而天之大纪也。”

晋公子重耳，即春秋时五霸之一的晋文公，为避祸于献公二十二年出逃，流亡在外 19 年，公元前 637 年十月晋惠公死，十二月重耳回国；次年（公元前 636 年）即位，是为晋文公。上面这段话是重耳在黄河边上问前来迎接的董因：“我这次渡河回去能成功吗？”董因回答说：“今年‘岁在大梁’，是集天之大成的年份；明年为‘岁在实沈’，是你即国君位的元年，‘实沈’是晋人居住之地，所以能兴旺起来，今天你回国正当其时，没有不成功的。再说你出逃之年（公元前 655 年）是‘岁在大火’，那可是收获的美好季节，也是后稷得以成功之时，‘岁在大火——星在大梁’也是唐叔虞的被封之年。你是‘辰’（岁在大火）年出逃，‘参’年（岁在实沈）即国君位，这些都是晋人吉祥的象征。而且，从‘辰’到‘参’为十九年，这是天时的一个大轮回（即十九年七闰，夏历的立春日与回归年同步了）。”

董因的这段话中明确地告诉了我们4个年份的星象：第一，重耳出逃之年（已知为公元前655年）的星象是“岁在大火”（星在大梁）。第二，回国之年（公元前637年）的星象是“岁在大梁”（星在大火）。第三，即国君位之年（公元前636年）的星象是“岁在实沈”（星在析木）。这就为我们推知幽王元年（公元前781年）是什么星象提供了一个依据。第四，唐叔虞的被封之年是“岁在大火”（星在大梁）。这为我们推知成王的年代提供了依据。

幽王元年为公元前781年，与晋文公元年的公元前636年，两者相距144年，恰好是十二纪。又知：晋文公元年（公元前636年）的星象是“岁在实沈——星在析木”，如果以岁星每86年超一个星次，那么，144年岁星必然走一个周期有多、两个周期不够，整星次是145个。如此可以推知：公元前781年，即幽王元年的星象是“岁在大梁——星在大火”。

根据岁星超次规律，从已知武王克商之年的“岁在鹑火”（星在天鼋），为超次之年，下一个周期应从成王元年的“岁在鹑尾”（星在娵觜）开始，到幽王元年的“岁在大梁”（星在大火），也是超次之年，岁星的运行是3个周期258年走261个星次。这就说明：“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它的年代上限是武王灭殷之次年，即成王元年（公元前1038年“岁在鹑尾，星在娵觜”）；其下限是幽王元年之上年，即宣王的死年（公元前782年“岁在降娄，星在寿星”）。从公元前1038年到公元前782年，恰好是257年。

从董因所说“岁在大火……唐叔以封”，可知成王弟叔虞被封于唐之年，是“岁在大火”（星在大梁）。读《史记·周本纪》知道：当周公灭唐的消息报至镐京时，成王和弟叔虞正在玩耍，成王随手拣了一片桐叶给叔虞说：“以此（指唐）封若！”这就是著名的“桐叶封弟”的故事，但其发生的具体年份却不清楚，如果通过岁星所在星次，便可推知是哪一年。已知武王克商之年是“岁在鹑火……星在天鼋”（公元前1039年）；“既克商，乃岁十二月崩镐”。又据史籍记载：武王死后成王继位，周公摄政当国，发生三监和武庚之乱，周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一年救乱，二年居东”；叛乱平定后灭了唐国，“桐叶封弟”应在此时。从星次的顺序看，依次为：“岁在鹑火，星在天鼋”、“岁在鹑尾，星在娵觜”、“岁在寿星，星在降娄”、“岁在大火，星在大梁”；那么，“岁在大火，星在大梁”必是成王三年（公元前1036年）。这个推断，年代前后衔接，情节上相互印证。所以，在正确解读星象以后，依据文献记载的星象词，是能够推算出某个历史事件发生的年份的。

关于武王伐商的月日，当时岁星在天鼋星次（在“子”位，正北方，为晨星），与其方位相对的是鹑火星次（正南方，为昏星），所以，我们解读“岁在



鹑火”为太阳月的仲春之月，夏历朔望月的二月与之相当。由此可见，《尚书·武成》中“一月壬辰旁死霸，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其“一月”当为“二月”；月象词“旁死霸”识为朔日，则“二月壬辰旁死霸”便为二月壬辰朔日，次日癸巳早晨武王从周地出发，前去征商。《逸周书·世俘》说：“越若来二月既死霸，越五日甲子朝，则咸刘商王纣。”这与星象相印证，表明武王伐商的时间是在夏历二月。月象词“既死霸”识为晦日（古代历法为单月大30天、双月小29天），“越五日甲子”便为三月四日甲子，牧野之战就发生在这天早晨。

《国语》伶州鸠说：“王以二月癸亥，夜陈，未毕而雨。”这也说明武王伐商是在二月，不过这个“二月”指的是太阳月的仲春之月，“癸亥”为仲春二月的最后一日，次日甲子便是季春三月的第一天。因为一岁（与一回归年是等同的概念）分为“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12个月，并以“十二星次”为标志。所以，伶州鸠所说的“二月”，实为仲春之月，与夏历的二月相当。需要注意的是：仲春之月和夏历二月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又紧密联系，夏历以月亮的朔望周期记月，可是其纪年又是以回归年（岁）为基础。一岁从立春日开始，24节气是一回归年的24等分。所以，季春三月的第一天必然是清明节（在夏历为三月四日甲子，反推这年的立春日在正月三日，也是甲子）。

伶州鸠所讲武王伐商时的一系列天象和历日，告诉我们夏历是典型的“阴阳结合”历法，与今天使用的农历基本一致。可见，西周时期所使用的历法为夏历。这就使我们正确地推算并制定出一个“古代夏正历朔公元年表”成为可能。本书所使用的《古历表》（借用林道心主编的《中国古代万年历》），就是这样一个“古代夏正历朔公元年表”。

从以上对武王伐商时历日的辨识，应该说先秦文献的记载是正确的（只有《尚书·武成》“一月壬辰旁死霸”中“一月”，为“二月”之误，而这个错误当发生在《尚书》复出之时）。可是，汉代人对天象词语的认识是混乱的，也可以说是正误参半。例如，孔安国在对《尚书》的《传》中注释月象词“既死霸”为朔日、“旁死霸”为二日等，刘歆肯定了这一说法。班固在《汉书·律历志》中说：“武成曰：三月既死霸，越五日甲子。”（显然是为了适应“既死霸为朔日”的认识，而对《逸周书·世俘》“二月既死霸，越五日甲子”的改动）又如，《史记·天官书》说：

摄提格岁，岁阴左行在寅，岁星右转居丑，正月与牛斗晨出东方。

单阏岁，岁阴在卯，星居子，以二月与婺女、虚、危晨出。

执徐岁，岁阴在辰，星居亥，以三月与营宝、东壁晨出。

.....

与《史记》成书差不多同时的《淮南子·天文训》却说：

太阴在寅，岁名曰摄提格，其雄岁星舍斗、牵牛，以十一月与之晨出东方，东井、舆鬼为对。

太阴在卯，岁名曰单阏，岁星舍须女、虚、危，以十二月与之晨出东方，柳、七星、张为对。

太阴在辰，岁名曰执徐，岁星舍营宝、东壁，以正月与之晨出东方，翼、轸为对。

.....

两相对照，文字叙述稍有差别，文义完全一致，但所称之月份则不相同。《史记·天官书》说：“摄提格岁……正月；单阏岁，……二月；执徐岁……三月……”而《淮南子·天文训》则说：“摄提格岁……十一月……东井、舆鬼为对；单阏岁……十二月……柳、七星、张为对；执徐岁……正月……翼、轸为对……”那么，哪一个是正确的呢？对比分析，不难看出《史记·天官书》是正确的。《淮南子·天文训》所称之月份虽然错误，但文中多出的一句“东井、舆鬼为对”“柳、七星、张为对”“翼、轸为对”，不仅正确，而且十分重要。它明白地告诉人们，与岁星所在方位相对的“东井、舆鬼”，指的是鹑首星次的二宿，孟春一月时正在南方；“柳、七星、张”，指的是鹑火星次的三宿，仲春二月时正在南方（即《尧典》“日中星鸟，以殷仲春”）；“翼、轸”，指的是鹑尾星次的二宿，季春三月时正在南方。……它们都是南方的昏星，观察它们便知是一岁中的哪个月。

但是，令人不解的是，《淮南子·天文训》的上述那段话为什么文义是正确的，而且指出了标示月份的星象，但月份却是错误的？同样令人不解的是，司马迁作《史记·天官书》所述星象、月份完全正确，《国语》“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星在天鼋”的话，他也是看到过的，应该知道武王伐商的时间是在仲春之月（当夏历二月），可是在《周本纪》中却写作“十二月”。这些正误掺杂的现象，原因实在使人费解。后来的专家学者对《史记·天官书》、《淮南子·天文训》有不少的译注，却都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当然也不可能正确地解读相关记载。

近年出版的有关中国古代天文学的著作，笔者手头就有3部：《泄露天机



——《中西星空对话》（陈久金著，2005年版）、《中国天文考古学》（冯时著，2007年版）、《权威专家的传统绝学——古代天文历法讲座》（张闻玉著，2008年版）。他们讲了古人对星象的认识，对二十八宿的概念和起源传说等作了考证，历法上度、分、秒以及如何计算年月日等，讲得十分细致。三书各有侧重，内容丰富，但是却都没有提及“十二星次”的问题，当然更未讲古人把黄道周天划分为“十二星次”的意义和作用。

把黄道周天等分为“十二星次”，以二十八宿作标志取名，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第一，“十二星次”标示一回归年（岁）的12个太阳月（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同时也就明白：二十四节气分别在每个月的一日和十六日。

第二，一岁（回归年）是从“鹑首星次”（井、鬼二宿作标志）开始的，称为孟春之月（孟春之月的第一天为“立春日”）；此时井、鬼二宿运行在正南方，黄昏时分能看到它们。当“鹑火星次”（柳、七星、张三宿作标志）运行在正南方时，为仲春之月（仲春之月十六日为“春分”）。当“鹑尾星次”（翼、轸二宿作标志）运行在正南方时，为季春之月（季春之月一日为“清明”）。……其余星次依次类推。

第三，从“鹑首星次”到“实沈星次”是黄道一周天，也就是一回归年。总之，一岁一周天，无需考虑地球运行的速度和岁差等问题。

第四，夏历的历月为朔望月（以月亮的圆缺周期计月，所以称为阴历），与十二星次标示的太阳月不能同步，但它却是以回归年（岁）为基础的，经过19年7闰便与太阳月同步了。也就是说，春、夏、秋、冬四季在一年中与天地自然基本上一致，各月与十二星次标示的太阳月虽不等同，却大体相当。所以，夏历的一年总体上也是从“立春日”开始的，这就是它与“阳历”的结合点；所谓夏历是“阴阳结合”的历法，道理即在于此。因此，当与星次一同讲历月的时候，便知所用为“夏正建寅”历法。

第五，岁星的运行基本上是“一岁走一个星次”，“十二岁一周天”；而且，岁星运行所在的星次方位上与各太阳月所在的星次总是相对的，如孟春一月的“鹑首星次”在正南方（黄昏时可以看见），这时岁星在方位相对的“星纪星次”（早晨时可以看见）。仲春二月的“鹑火星次”在南方（黄昏时可以看见），这时岁星在方位相对的“天鼋星次”（早晨时可以看见）。季春三月的“鹑尾星次”在南方（黄昏时可以看见），这时岁星在方位相对的“娵觜星次”（早晨时可以看见）。……由此可知：表示月份的星次，与表示回归年（岁）的岁星所

在星次，两者方位总是相对的，一为昏星、一为晨星，一个纪月、一个纪年，是“十二星次”把它们联系起来的。

“十二星次”的划分虽然是人为的，却是星象运行的客观反映，符合自然规律。其用来计月、计年、确定时令，只要仰观天象，便可准确知晓；以此来“敬授民时”，指导农业生产，十分科学，可见古人的智慧。只是由于时代水平的限制，他们不知道岁星运行中“赢缩”现象产生的缘故，因此用迷信去解释；但是，在古文献中记载的岁星所在星次及年份（包括了岁星“超”行的星次），却符合当时的真实情况（这在我们推算年代时可以测知）。

西汉末年的刘歆作“三统历”，他已认识到岁星的运行并非每岁恰走一个星次，而是存在着“超次”的现象。这是一个有重要意义的发现。但他认为“144年超一个星次”则不正确。现在准确测知：岁星的运行是每86年超一个星次，即86年走87个星次。

上述正误掺杂的情况，恐怕就是对武王伐商年、月判断不清，甚至有误的原因。《史记·周本纪》说：“西伯（文王），盖受命之年称王，而断虞芮之讼，后七年而崩。”对此，《史记正义》指出：“帝王世纪云：文王即位四十二年，岁在鹑火，文王更为受命之元年，始称王矣！……七年当为九。”《史记·周本纪》又说：“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盟津……居二年，闻纣昏乱，暴虐滋甚……以东伐纣；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对此，《史记正义》指出：“武王伐殷，太誓篇云：惟十有三年春，大会于孟津。……按：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十一年武王服阕观兵孟津，十三年克纣。”

但是，许多历史学家似乎对此并未予以认真对待，现代的有些历史专著（如杨宽著《西周史》）仍坚信《史记》的说法，认为武王伐商是文王受命之十一年。其实，先秦文献记载比较零散，如果综合联系起来，是能推算出来的。《尚书·无逸》载：“文王受命唯中身，厥享国五十年。”可知文王在位前后总共50年，42年称王，更改为受命之元年，50年死，其间就是9年。《逸周书·文传》说：“文王受命之九年，时维暮春，在镐，召太子发曰：呜呼，我身老矣！”证明文王确是死于九年。文王死后4年武王伐商，“九年”加“四年”恰为13年。以“十二星次”推之，文王称王之年（元年）是“岁在鹑火——星在天鼋”，到武王伐商之年也是“岁在鹑火——星在天鼋”，岁星运行了13个星次，为13个年头，所以，武王伐商以文王受命（称王）之年连续计算，必然是13年。

武王伐商的月日，《史记·周本纪》说是“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而《尚书·武成》的记载是：“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越翼日癸巳，……既戊午师逾



盟津。”《尚书·武成》的这个记载前后日序不能衔接，明显有误。对此，班固在其《汉书·律历志》中解释说：

癸巳武王始发，丙午还师，戊午度于孟津。……明日己未冬至，晨星与婺女伏，历建星及牵牛，至于婺女、天鼋之首，故《外传》曰：“星在天鼋”。《周书·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纣。”《序》曰：“一月戊午师度于孟津”。至庚申，二月朔日也。四日癸亥至牧野，夜陈，甲子昧爽而合矣，故《外传》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陈”。《武成》篇曰：“粤若来三月既死魄，粤五日甲子，咸刘商王纣。”是岁也，闰数餘十八，正大寒中，在周（历）二月己丑晦，明日闰月，庚寅朔；三月二日庚申惊蛰；四月己丑朔，死霸。死霸，朔也；生霸，望也。是月甲辰望，乙巳旁之，故《武成》篇曰：“惟四月既旁生霸，粤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庙……”

班固的推算可谓详细，但却是似是而非的。王国维在其《生霸死霸考》一文中指出：

由旧说推之，既以一月二日为壬辰，二月五日为甲子，则四月中不得有庚戌，史迁盖不得其说，于是移武王伐纣于十二月，移甲子诛纣于正月。刘歆不得其说，于是于二月后置闰，然商时置闰皆在岁末，殷墟卜辞屡云“十三月”。武王伐纣之时不容遽改历法，此于制度不可通者，不独以既死霸为朔，旁死霸为二日，既旁生霸为十七日，为名之不正而已。

别的不讲，仅就王国维的这一段话来说，是正确的。不过我们要补充的是：《汉书·律历志》所讲之所以不正确，关键还是对“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星在天鼋”这个星象词，以及月象词“既死霸、旁死霸”等没有解读正确，所以，对《尚书·武成》的历日存在前后不能衔接的原因，也就无法破解。

前面已经说过，“岁在鹑火”指的是仲春二月；《尚书·武成》的第一句“惟一月壬辰旁死霸”，就应改正为“二月壬辰旁死霸”。再把月象词“既死霸”为晦日，“旁死霸”为朔日，“哉生明”（朏）为三日，“既生霸”为十四日，“既旁生霸”为十五日，“旁生霸”为十六日的认识代入《尚书·武成》，其历日可以排序如下。

“惟一月壬辰旁死霸”即是：二月朔日壬辰（“一”和“二”仅一划之差，竹简隐藏的年代长久，字迹极易损坏，所以，“一月”之误，很可能是《古文尚书》复出时发生的）。

“越翌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便是：二月二日早晨，武王从周地出发征商。

“既戊午，师逾孟津”便是：二月二十七日周军在孟津渡过了黄河。

“二月既死霸，越五日甲子，咸刘商王纣”（《逸周书·世俘》）便是：二月二十九（晦）日庚申，周军从黄河北岸某地出发，向商都挺进；经过5天，三月四日甲子早晨在牧野与商军作战，一举打败了商军；甲子夕，纣王自焚。

“厥四月哉生明，王来自商，至于丰”是说：四月三日癸巳，武王回到了丰邑。

“既生霸，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便是：四月十四日甲辰，众诸侯和百工接受周王的任命。

“丁未，祀于周庙”便是：四月十七日，在周庙祭祀祖先。

“越若来四月既旁生霸，越六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是说：四月二十日烧柴，望祭山川大地，宣告革命成功。

我们看，只要把“一月”改正为“二月”，问题便迎刃而解了；月象词与日干支结合，《尚书·武成》和《逸周书·世俘》的全部日序前后衔接，一日不错，这就说明了一切。

那么，运用岁星的运行规律，结合先秦文献中所载星象词，推算出武王克商之年，就不是困难的事了。“夏商周断代工程组”推算出的年代之所以不正确，问题就在于把当年的岁星在“天鼋星次”误以为是在“鹑火星次”。但这只是前提有误，而非推算方法的问题。张钰哲先生认为：武王伐纣为公元前1057年，当时岁星正在鹑火星次。《中国大百科全书·天文学》“十二星次”条介绍说：

据中国天文学家张钰哲近年关于哈雷彗星轨道的研究，认为武王伐纣应为公元前1057年。当时岁星确实正在鹑火星次，所以伶州鸠的这一说法（即《国语·周语下》记载的：“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应是周初的实际观测。

我们丝毫不怀疑“公元前1057年，当时岁星确实正在鹑火星次”的正确性，问题在于武王伐纣之年的岁星并不在“鹑火星次”，而是在“天鼋星次”。这不是张钰哲研究推算之误，恰恰相反，他的研究可以间接地证明武王伐纣之

年是公元前 1039 年。我们依当年岁星在“天鼋星次”去推算，从公元前 1057 年到公元前 1039 年，相差 18 年；岁星的运行，从公元前 1057 年的“鹑火星次”，到公元前 1039 年的“天鼋星次”，是 18 个星次，也就是 18 个年头。所以，张钰哲如果依武王伐纣之年的岁星是在“天鼋星次”的话，其结论必然是公元前 1039 年。

这里要注意的一点是：岁星的运行是一岁走 $1\frac{1}{86}$ 星次。在 86 年走 87 个星次的周期中，“超次”是逐渐积累的，因此“超次之年”是在 86 年的最后一年，而且都落在“天鼋”、“大梁”、“鹑火”、“大火”四个星次上。也就是说，“超次之年”岁星恰好于立春日进入上述四个星次之中的一个星次，其余的 85 年则不然，岁星进入某个星次，不是超前，便是滞后，在短期内则可以视作一岁走一个星次。

陈久金先生判断武王克商之年在公元前 1046 年一月二十二日，也是以“岁星在鹑火星次”的认识为前提的。从“鹑火星次”到“天鼋星次”以顺序计，是 6 个星次，岁星运行 6 星次，即 6 个年头。但其年数与公元前 1039 年却相差 7 年，即多了 1 年。我们猜测陈先生可能是把“超次”的那个星次算作一年了，因为这已经是 86 年一个周期的最后阶段，岁星运行的“超次”情况，差不多是一个整星次了。

江晓原先生推算武王克商之年是在公元前 1044 年。据他自己说，是他用先进的大型计算机对岁星运行情况经过了长时间的计算，应该说是可靠的；但他也是以武王克商之年“岁星在鹑火星次”的认识为前提的。其结论与公元前 1039 年却只相差 5 年，也就是说，从“鹑火星次”到“天鼋星次”只有 5 个星次。我们猜想江先生可能忽略了岁星运行中的“超次”现象，因此少算了 1 个星次。

至此，以往对武王克商之年存在的疑问及其错误产生的原因，基本上都得到了解答，但是，还有两个重要的问题，也是必须回答的：

其一，文王于四十二年称王，年号更改为受命之元年，九年死。文王死后肯定是太子姬发继位，继位的第四年伐商，称文王受命之十三年。试问：武王为什么要称文王的年号，而不称自己继位四年这一年号呢

其二，近年发现的“清华简”记载：“武王八年伐黎”。“伐黎”这件事，即《尚书·商书》中的“西伯戡黎”篇所讲之事，引起了商王朝大臣的恐慌。这是为人们所注意的一篇。过去一向认为“西伯”指的是文王，笔者在拙著《商周断代新考》中指出：“如果文王确曾被‘纣囚七年’的话，戡黎的西伯应